

■ 李帆 / 主编

民國思想文叢

【學派】

杨毅丰 康蕙茹 编

長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李 帆 / 主 编

民國思想文叢

一 內 派 一

杉 象 丰 康 蕙 茹 编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衡派 / 杨毅丰, 康蕙茹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3.1
(民国思想文丛)
ISBN 978-7-5445-2655-5

I. ①学... II. ①杨... ②康... III. ①学衡派—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3884 号

学衡派

编 者: 杨毅丰 康蕙茹
责任编辑: 张耀民 胡 新
封面设计: 大 熊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7997924

编辑说明

本集收录体现“学衡派”基本思想主张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多选自《学衡》等杂志及学衡派诸人的文集、选集等。

在作品编选过程中，尽量以存其原貌为要，除对明显错字有所改动外，其余皆悉仍其旧。由于《学衡》等杂志年代较早，部分语言习惯和人名译法与今有所不同，存在不少讹误，但出于忠实原文考虑，均未作改动，原文注释也一并保留；标点符号均统一为新式标点；个别篇目有所删节，以省略号标出；文中凡有损坏、缺漏或字迹不清者，以□号表示；正字均以〔 〕标明；每篇文章之后注明出处和发表年月；有的文章录自相关文集，初刊时间无从查考，则暂从文集出版年月。

与其他流派相比，学衡派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不少作者都有佳作传世。本集力求囊括最能代表该派思想的作品，但囿于篇幅，仅能选编部分，难免有遗珠之憾。另外，把握这样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皆有渊源的流派，我们深感力有不逮，舛错失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不吝指正，以便今后修改完善。

编 者

总 序

思想如何分类，向来是个难题。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呈现多姿多彩的面貌，每一种思想皆各有主旨，各具风采，特色鲜明，或可名之曰“家”，或可名之曰“派”，晚近则有“流派”之名。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两个时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先秦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时期。先秦自不必说，诸子百家，各显其能，争鸣不已，异彩纷呈，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影响及于后世两千余年。民国思想虽未能再现“百家争鸣”的胜景，但亦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甚多，思想文化论战此起彼伏，思想交锋异常激烈和复杂，而且实现了对中国固有思想传统的实质性的挑战与超越，形成一些新的思想、学说体系，整个思想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晚清以来西学的大举进入，西方思想、学说与中国固有观念、学问的碰撞、交融，已使得相对单一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遭到极大冲击，乃至近于分崩离析，从而为民国时期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又在于形成于清末、壮大于民国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尤其是清末民初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在民国年间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力量。所受教育的差异以及与各类集团、群体、势力的不同关联，使得他们形成相异的思想、文化理念，在当时各种矛盾纠葛交织的时代环境下，往往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问题提出自身旗帜鲜明的主张，并引发激烈、复杂的论战与斗争；也在于民国北洋政府，尤其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尽管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但因各种原因，还是给予思想家和学者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允许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并存而且彼此展开争论；还在于民国时期社会空间的相

对扩大，如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建立与迅速发展，报刊、出版业的极大发达，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等等，为思想界精英结合成志趣相投的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些因素下，民国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

作为思想繁荣的表征之一，便是民国时期出现思想家群体和流派众多的景象。这些群体和流派主要分布在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领域，此外在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内部也不乏各种流派。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主张各异，或趋近于民族主义，或趋近于激进主义，或趋近于自由主义，或趋近于保守主义，不一而足；而且延续的时间也长短不一，有的起步于清末，进入民国后发扬光大，绵延数十载，有的仅在北洋政府时期或国民政府时期昙花一现，数年后无果而终。由于流派是个不易界定的概念，大家对之的认知不同，于是人们所认定的思想流派的存在方式也不全然一致，有的依托于同人报刊或出版物而存在，甚至一个刊物就会造就一个流派，如甲寅派、新文化派（或称新青年派）、现代评论派、学衡派、古史辨派、醒狮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战国策派、观察派等；有的依托于某一机构、团体或党派而存在，如所谓北大派、南高派，以及乡村建设派、国家主义派等；有的仅仅因为主张趋同而被视为一派，如无政府主义派、科学派、玄学派、西化派、文化保守派等。就流派的划分界定而言，这些“派”并非完全处在同一层次，其中既有角度、性质之别，又有大小之分，还有人员、主张等的多重交叉，甚至是派中有派，如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中又有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同的思想派别存在。由于思想流派众多，思想文化论争也因而接连不断，如民国初年的孔教之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文言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故而民国时期成为继先秦之后，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论争最多的一个时期。

通过发布并实践自身的主张，这些流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让国人听到了思想家们独到的声音。而且这样的声音在争鸣中成长壮大，日臻成熟，自成一派。无论其主张如何相左，但整体而言，大抵皆对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和整个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从各自立场发挥了思想支撑和引

引领作用，并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从民国思想史的研究状况看，学术界对这些流派虽有所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派中人，如刘师复、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吴宓、梅光迪、柳诒徵、顾颉刚、张君勱、曾琦、李璜、梁漱溟、晏阳初、张奚若、罗隆基、梁实秋、雷海宗、林同济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整体而言，非常不乐观，不仅是某些流派未被全面系统的探讨过，而且有些派中人乏人问津，形成不少学术空白点。这一情形的出现，与多种主客观因素相关，如问题意识的局限、一流之外的思想家不被重视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原始文献资料的缺乏系统整理，导致研究者无从着手或着手不易，从而知难而退。近年来，出版界虽推出了不少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方面的文献资料集，不过总体而言，这些资料集重晚清轻民国，晚清思想资料的出版蔚为大观，系统性颇强；而民国思想资料的出版则相对不足，尽管已有一批思想家的个人全集、文集、选集等陆续出版，也有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汇编一类的书先后面世，但存在着要么过于分散、要么过于笼统的弊端，针对民国思想特点而编的特色性资料集不多，如以思想流派作为归类的文献资料集就尚属空白。所以，以“民国思想文丛”之名系统整理出版民国思想的文献，显然是极为必要的，既能克服已有出版物或分散、或笼统的弊端，又能体现民国时期思想流派众多这一思想史特色。对于研究者来说，“民国思想流派文丛”可为其研究民国思想流派史提供一份基本资料，为其研究派中人物提供一个基本语境；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执一卷在手则知一派，可作为进入丰富多彩的民国思想世界的原始读本，以此为起点，集腋成裘，就能进而了解民国思想史的整体面貌。

由于民国思想流派众多，一时难以穷尽，所以这套文丛首先选取当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无政府主义派、新文化派、学衡派、古史辨派、国家主义派、乡村建设派、现代评论派、新月人权派、战国策派的基本文献编入，其他流派只能俟诸他日。在编排结构上，每派一集（现代评论派与新月人权派的思想主张和存在时间都相近，故合为一集），每集内部以人物为单位编辑文献，挑选该人最能代表该派思想的论说编入，每篇文献后注明出处。各集编排顺序如下：编辑说明、流派介绍、文献汇编、参考文献。其中数万字的“流派介

绍”，主要是简要介绍该集所涉流派的基本情况、人物生平、思想主张、时代影响等，以使读者对该派思想有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由于各派情况有异，故在写法上各集可能略有不同；“参考文献”则在提供该派文献之出处的同时，列出可扩展阅读的论著目录，以方便意欲进一步探索的读者。

选编这样一套经典性的近现代思想文献，不论对谁都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深知力有不逮，舛错失误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赐教，以利将来修订完善！

此外，本丛书中收录的某些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与作者家属或后人取得联系，望有了解此类情况者及时与编者联系，在此谨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李 帆

2012年1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学衡派评介 / 1

吴 宓 / 23

文学研究法 / 23

论新文化运动 / 27

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 / 39

我之人生观 / 55

论事之标准 / 69

梅光迪 / 73

评提倡新文化者 / 73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 77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 82

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 86

安诺德之文化论 / 89

孔子之风度 / 95

言论界之新使命 / 99

斥伪教育 / 102

卡莱尔与中国 / 104

西方在觉醒吗 / 111

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 / 115

评《白璧德：人和师》 / 125

柳诒徵 / 134

华化渐被史 / 134

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 / 169

论中国近世之病源 / 192

论大学生之责任 / 197

说习 / 204

明伦 / 206

 胡先骕 / 210

- 论批评家之责任 / 210
-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 / 218
- 文学之标准 / 223
- 论博士考试 / 240
- 观我国历史之演变国人应有建国之信心 / 242
- 中国科学发达之展望 / 248
- 论反基督教运动 / 250
- 中国文学改良论 / 252
- 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 / 255

 缪凤林 / 265

- 《四书》所启示之人生观 / 265
- 文德篇 / 272
- 文情篇 / 276
- 文义篇 / 284
- 历史之意义与研究 / 288
- 人道论发凡 / 292
- 文学上之摹仿与创造 / 299
- 悼梁卓如先生 (1873—1929) / 307
- 文化的训练 / 310

 刘伯明 / 314

- 学者之精神 / 314
- 再论学者之精神 / 316
- 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317
- 杜威论中国思想 / 321
- 非宗教运动评议 / 324
- 共和国民之精神 / 328
- 论学风 / 331
- 文学之要素 / 335
- 关于美之几种学说 / 340

 张荫麟 / 344

- 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 344

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 / 347
从政治形态看世界的前途 / 362
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 / 365
说民族的“自虐狂” / 371
论修明政治的途径 / 373
民生主义与中国农民 / 375
新广东之精神 / 377
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 / 378
哲学与政治 / 381
论中西文化的差异 / 384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 390
参考文献 / 395

学衡派评介

20 世纪初，风雨飘摇多年的清室终于倾颓，民国肇建，但空有其名，内外交困的局势将革命者所勾画出的乌托邦击得粉碎。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有识之士纷纷从国外思想文化领域汲取先进理论，对照本国国情时势，开出救国药方。如何处理新与旧、中与西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所谓“不破不立”，在“破”与“立”的对象选择和力道把握上，“学衡派”的观点与当时学界的主流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截然不同。近代中国社会，“激进”一词几乎与“革命”一样，被先验地赋予了相当程度的正面性。作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重要成员的学衡派，因其思想近于保守、论点过于理想化而一直处于被贬低、嘲讽的境地中。至上世纪 80 年代末国学热升温，一时间“思想家淡隐，学问家凸出”，学衡派之主张所蕴含的学理价值才重新为世人所了解和认可。不论学衡派所极力主张的“道德、秩序、中庸、古典”在人心惶惶的乱世有多少理想主义色彩，它立足传统，希图防止有“矫枉过正”之嫌的自由激进主义思潮所导致的文化失范的忧切之心，还是值得后人肯定和敬仰的。

一、反思现代性与新人文主义

戊戌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内部传统文化危机和外在政治危局的双重冲击下，保守主义思潮不断被一浪比一浪高扬的激进主义思潮盖过。中国社会整体上保持着激进变革的趋向，而这一趋向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成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流思潮。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带动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激进，其思想背景和理论来源是欧洲启蒙运动和欧美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与传统是敌对的，因为它只承认被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规则，而这些知识又与科学程序和理性分析密不可分。那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实质性传统应该被取代。”^① E.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下的论断，恰可被概括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学衡派的集结与发声，很大程度上与其同人对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文化激进主义持否定态度有关。这两个流派的区别，在于承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可以被西方文化理念唤醒的合于时宜的现代性因素。新文化派认为时不我待，当务之急在于全面推倒传统；学衡派认为新文化派极力主张推翻的传统信条，恰恰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和伦理交际

^①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7 页。

的支柱，不仅不应摒弃，反而应当沟通西方古典文化，融合当代欧美理论，使之新生。这样，被“昌明”后的“国粹”，虽于时于势难见速效，但在传承、焕新文化方面，于国于民实有大功。

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文化派和学衡派这一辈负笈欧美的学人多受到西方知识资源上的支持。1914年至1918年的欧战对西方社会造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极大打击，西方思想界开始反思对于科学、机械、效率化等现代性因素的追求是否蒙蔽了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意志。尼采的超人学说和非理性主义观点宣告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以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德国哲学家倭铿（R. C. Eucken）为代表的强调精神生活和生命直觉的生命哲学风靡一时则是这一思潮趋于高涨的重要表征。时人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多有介绍和赞誉，梁漱溟在其反响颇著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写道：“（西方）这时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学”，“而这派的方法便是直觉。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其转捩即在这派的哲学。”^① 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是在欧战结束之后，尤其在1920年初梁启超诸人游欧归来以后，以梁氏《欧游心影录》的发表为最重要表征。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张君勱、梁漱溟、杜亚泉等纷纷撰文，或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为东西方文化特征，或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东西方哲学，皆有借东方文明注重性灵的特点弥补西方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缺陷之意。学衡派的大概理路也是如此，他们从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那里接受并加以引申倡导的新人文主义，亦是作为批判理性教条主义的反省现代性派别出现。白璧德称自己主张的是“新人文主义”、“科学的人文主义”，以区别于古典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学生称呼他们教授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为 Humanista，这些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逻辑学、修辞学、天文、历史、哲学等科目则被称作 studia humanitatis，英文即“the humanities”（人文学）。十五六世纪的艺术家们希望通过学习这些古典学问来获得对人的价值具有首要地位的重新肯定，而他们所持的这一世界观，也被后世目为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因而称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与中世纪欧洲封建蒙昧主义的斗争下，表现出乐观主义和理性进取的精神。其后经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理性主义得到了空前的高扬。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更是引起对理性的极端崇拜。理性的触角可以探测到自然的一切奥秘，人因为拥有理性而一时间主体性高涨。然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很快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暴露出来，周期性经济危机、尖锐的阶级对立使得传统道德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难以停歇的奋进齿轮中日渐消磨，闲适安逸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复返。人虽然冲破了神的网罗，却

^① 《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页。

发现自己又陷入了理性织就的樊笼之中，人的个性被压抑在理性原则所强调整体性、同一性之下。郑师渠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人文主义的转型：由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①由于传统意义上人文主义的三大特点：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尊严以及重视思想批判，都得到了继承，阿伦·布洛克将其称之为“新版本的人文主义”、“新的人文主义”。^②以白壁德、穆尔、薛尔曼为主将的新人文主义，自称前绍19世纪“第一批评论家”、英国人文主义大师阿诺德的余绪，既反对机械工业大生产时代人们对于科学理性的盲目崇拜，也不赞成卢梭、尼采等人的浪漫无羁，他们所追求的是昭显真善美这一终极价值，关怀人类精神家园。

以白壁德为首的新人文主义，其主要理路可以概括为：“一、多”融合的认识论、“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理制欲的实践道德论。^③白壁德选择柏拉图的“一、多”概念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他所谓的“一、多”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从本体论意义出发，意思与柏拉图的原意接近，指的是绝对理念与多样化的具体事物；第二重是指实践意义上，集约与博放，纪律与自由的对比。在他们看来，人的本性由“理”、“欲”两个部分组成，“欲”为自然，同于物性，代表自私、混乱、危险的一面；“理”则超乎自然，在物之上，代表克制、秩序、标准。这两个部分与生俱来，不会消逝，因此人性中存在着永久的善恶冲突。要保持人性的清明完善，就必须时时刻刻以理制欲，扬善抑恶。

白壁德等人借助善恶二元的人性论来反思现代工业社会的弊端之源。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和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是古典西方文明对人性二元的绝佳制衡。“现代社会反对封建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是对的，但它同时复破坏和否定了旧有的二元论，犹如在倒脏水时将盆中的孩子一同倒掉了一样，不能不陷于谬误。”^④基督教传统基督教传统被批判，旧有的文明精神也逐渐湮没。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成为启蒙运动后欧洲文明的两大新元素。这两大元素虽表面存有分歧，但一为竭力开发自然，一为竭力释放人欲，皆可概括为物性。“故今日者科学与感情的浪漫主义并立称霸，而物性大张，人欲横流之时代。彼宗教与人文，仅有一线之生机，不绝

①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②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9页。

③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④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如缕。”^① 新人文派所要做到的，正是传承这不绝如缕的两大古典文明元素，一方面克制私欲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一方面完善自我融会中西，恢复精神的纪纲。“藉全人类文明的精华，确立正当的标准，对于一己的意志和生命的冲动行理性的导引和制裁，以求内心生活的和谐，并不断超拔自己以日趋于真善美的境界。”^② 白璧德的中国弟子吴宓认为其师虽“不涉宗教”、“不务玄理”，却“实兼采释迦、耶稣、孔子、亚里士多德四圣之说，而获集其大成。又可谓之为以释迦耶稣之心，行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释迦耶稣之心”，表明新人文主义者具有一定超俗的宗教性；“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表明新人文主义者最终的旨归仍是落在俗世，以人人独善其身来挽世界于既颓。

新人文主义者视道德观念高于一切，白璧德强调：“政治之根本在于道德……即改善人性，培植道德是也。”而他们对于至高至上道德的定义，为持中自律、情理融合，亦即中庸。阿诺德认为人不能完全顺从自我的天性，对于这种天性必定要加以制裁。白璧德也说“凡人欲其拣择正当，必先有正当标准，欲得正当之标准，必须对于一己之意志冲动，时刻加以限制。”^③

梅光迪曾把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行为视为人文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他批评30年代的中国已是世界上除了苏俄外最无传统可言的国家。学衡派力图告知民众，西方文明不是只有“19世纪的精神面貌”，而是“它所有的历史中包含的精神本质”。梅光迪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好比一个人，“如果其本身和它所模仿的东西之间不能达到和谐、一致，那么这种肤浅的模仿便是毫无益处的。”^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西方文明中精华而古典的部分激发出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创造力和适应力，才是既能在本质上保持中国特色，又可以完成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两全之策。

二、学衡派及其代表人物介绍

学衡派的存在是建立在反新文化运动以及反对北京大学的基础上的。沈卫威认为，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尖锐对立建立在彼此共存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儒学本位与西方文化（科学、民主）、尊孔与反孔、古文与白话、信古与疑古等多重关系之上，同时从地缘上出现了南与北、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在思想、学术中的差异。^⑤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掀起的文学革命，可谓一场由辩论引

① 陈钧译：《福禄特尔记阮诒与柯兰事》一文的“编者识”，载《学衡》第18期，1923年6月。

②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③ 《安诺德之政治思想与社会》，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3号，1922年12月。

④ 梅光迪：《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⑤ 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发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兴起和如火如荼的演进，又是学衡派为主体的反抗新文学——新文化话语霸权运动形成的诱因。这场辩论的双方，就是新文化派和学衡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和梅光迪。

胡适、梅光迪都是安徽人，早在上海读书时，经胡适宗兄胡绍庭介绍而相识，很快就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1910年和1911年，两人又先后赴美留学（胡适比梅光迪早一年）。胡适到美后，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社会活动频繁。他热心的态度和出众的口才有时也会引来非议，梅光迪却对胡适赞赏有加，将其比作“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认为“幸有适之时时登台，发彼聋聩，彼亦当不谓秦无人矣”。^①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打算转至哈佛大学继续深造。是年暑假，他来到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与求学于此的胡适、任鸿隽、杨杏佛等一众好友共度，经常一起讨论中国文学问题。梅氏离开绮色佳时，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相赠，其中有诗云：“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然而起初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看法更接近于改良，要求在作诗时不避“文之文字”，使得“作诗如作文”。梅光迪对此明确反对，反复与胡适通信，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文学革命今非其时，“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胡适亦不放弃主张，利用学余钻研中国文学史，得出“第一流的文学，皆以俚语为之，是活文学”的心得。1916年胡适在与友人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式时，已经大胆提出“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的主张了。针对好友任鸿隽的一首用四言写就的《泛湖即事诗》，胡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② 梅光迪见到此信，认为胡适太自以为是，更不同意其“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坚持诗为诗人、美术家之专利，不应为村农伧父之俗语所扰，若“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人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委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③ 胡适亦不甘示弱，在半是揶揄半是逼迫的情境下，写下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为复。此诗长近千字，这里仅作摘录：“‘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今我苦晓舌，算来却是为何？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这首戏作标志着

①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2年正月十七日），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② 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0页。

③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七月十七日），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这对好友在如何改造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梅光迪闻信又急又怒，回执指责：“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并劝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① 绮色佳的中国留学生多持梅光迪的观点，胡适在其间颇感孤立无援。然而恰在此时，大洋彼岸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迁京后改名《新青年》），鼓吹和发起新文化运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为胡、陈两人牵线，并受陈独秀之托向胡适索稿：“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1917年，胡适将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加以详细论述，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和留美学生刊印的《留美学生季刊》上，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同年秋，胡适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刘贵福注意到，几乎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梅光迪于1917年1月在《中国学生月刊》上发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梅光迪认为，当前诚然需要有挣脱习惯束缚的力量和勇气，然而过于猛烈的挣脱却容易导致中庸的丧失。在一个动荡狂躁的社会环境中，一个民族的前进和文化的传承尤其需要理性和稳健的心态。一时的冲动行为容易在卑微地模仿过去和反传统两个极端间摇摆。所以他提出：“我们这一代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寻找一种方法，重新调整变动不居的情况，去收获新与旧融合的最佳成果。”^② 然而这个躁进的时代已经等不及听这些略带理想主义的缓效性言论，1920年梅光迪回国时，教育部已颁布命令，自是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用白话文教授。不久，大中小学教材全都改用白话文。梅光迪不满于胡适与陈独秀联手推进的“新文化运动”，尤其对胡适因鼓吹“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感到愤懑不平。他在美国延揽人才，“招兵买马”，准备回国后与胡适大战一场。1918年8月初，后来成为《学衡》杂志的实际主持者的吴宓，经原清华同学施济元介绍，与梅光迪“屡次作竟日谈”，吴宓在日记中记述道：“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驱驰，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③ 随之，吴宓与同在哈佛的陈寅恪、汤用彤、楼光来、张歆海、顾泰来等因“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而结为好友。吴宓之女吴学昭

① 《梅光迪致胡适信》（1916年七月二十四日），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② “The Task of Our Generation”，《梅光迪先生家书集》，第190、192页。转引自刘贵福：《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7页。